



●……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

——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男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

——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男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 孔祥吉, [日] 村田雄二男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18-06898-5

I. ①从… II. ①孔…②村…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582 号

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孔祥吉, [日] 村田雄二男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柏峰

装帧设计：张力平 张竹媛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经销：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www.gdpgfx.com）

印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6898-5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43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560

望皇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

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則戡。自永曆建元。窮於辛丑。明旌既移。而炎黃瘞漢之邦族。亦因以漸滅。迴望皇清。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瘼而告變。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斯惡之。寧後歐美分割。始云郊丘乏主也歟。自頃品庶靡靡。邦人諸友。怒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軒輶定命。國存與立。抑其秩序。無乃陵躐。衡陽王而慶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疆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紐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德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曼殊八部。不當數言之衆。雕弓服矢。未若鎗彈之烈。而劍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高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跪。葺技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官練。鞭垂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拌舞術族。不其悖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駭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移。民無同力。恬爲胡荼。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視。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子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梨洲之所乞師。頽然不怡。永懷曠昔。蓋望神靈悉木者。則輿輿土之精。親孤寡孀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思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開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乃召嗜侶。集會紀念。以志亡國。凡百君子。蟬嫣相屬。同茲惻

願吾蜀人無忘天子定國 願吾國人無忘和成功 願吾越人無忘始禮言 願

務 願吾蜀人 無忘天子定國 願吾國人 無忘和成功 願吾越人 無忘始禮言

吾吳人 無忘禮式稱 願吾楚人 無忘蒙正發 願吾燕人 無忘李成榮 明天演以箴大同 察種源以別蒙古 齊民德以哀同風 鼓芳風以扇游歷 庶幾陸沈之禍 不違而復 王道清夷 威及無外 然則休戚之藪 悲欣之府 其在是矣 莊生云 舊國舊都 望之嚮然 雖丘陵草木之縵 入之者十九 猶之嚮然 況見聞聞者耶 嗟乎 我生以來 華髮未艾 上念陽九之運 去茲已遠 復還數稔 逝者日往 災巢徐痛 誰能撫摩 每念及此 彌以腐心流涕者也 君子

會 約

- 一本會無論官商士庶凡屬漢種皆可入會和人有贊成者待以來賓之禮
- 一本會不取捐資樂助者聽
- 一本會每歲開設二次會期臨時擇定要以陽曆四月九月爲限
- 一本會此次開會定期陽曆四月廿七號午前十一時於七日前先行知照赴會與否望玉接信後三日示覆

辛丑後二百四十二年

章炳麟 馮懋龍
秦鼎彝 王 熊
支那遺民周 達 馮斯傑 啓
、唐 麟 李 群
馬 同 朱 榜

清朝亡国历史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代序言

读者看到此书之时，大约就快到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刻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清王朝皇冠落地，灰飞烟灭，已经一百个年头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我们把清末这段令人惋惜、让人气愤的历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予以透视。把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与人物的真实面貌，用中日两国的原始档案记载，予以勾画揭示，看看这段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人们常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脉相连，关系至为密切。从有翔实文字记载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清末一船又一船的传统士子，争先恐后地赴东洋游学，这两个邻国之间，总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竞争。

但是，从同治七年（1868）开始，中日两国的历史列车，换了轨道，朝着不同的方向疾驰。他们开始时的起跑点大体相同，都是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以农林牧渔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也同是西方列强欺凌掠夺的对象。可是，四五十年之后，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二重桥的皇居，古老的塔楼，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围绕着皇居庭院护城河的流水，依然是碧波荡漾。日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洗心革面，由一个受人欺凌的弱国，变为一个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由原来一个弱小国家一跃而为欺凌别国的强权。而紫禁城里，却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儿寡母“垂泪

对宫娥”的历史悲剧。其原因究竟何在？这段历史实在应该认真地予以总结。

众所周知，日本在中国鸦片战争发生后，社会亦面临被列强凌辱的危机。美国海军准将培里，曾于1853年7月8日率领军舰驶抵江户的浦贺，耀武扬威，强行叩关，其他列强亦虎视眈眈。日本政府于庆应四年四月四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义，发布由利公正、福冈孝第先后起草一稿二稿，木户孝允最后改定的施政纲领《五条誓约》。其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①

《五条誓约》，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提出的。它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与经济诉求，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之路，创造了条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却包含了民主的精华和对外扩张的因素。《五条誓约》颁布后，日本大体上是按照条文的内容行事。

紫禁城的当政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一个昏庸闭塞、充满私心的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她退下权位仅仅三年，清王朝就遭遇了亡国之祸。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清王朝在最后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这个近邻，稍稍做些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清王朝存在着三个重大失策。

其一，错失改革机遇，开历史倒车，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在西方国家纷纷完成近代化过程之后，随着西风东渐，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亚洲伸出侵略触角。作为被欺凌的国家，面临的唯一出路就是启动改革，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① 伊文成、马家骏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1987年版，第355页。

日本的明治天皇在继位初期，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力图使全国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张旗鼓地宣讲变法的迫切性，“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励民众齐心协力，将改革大业推行到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几次严重挫折之后，却没有表现出改革的诚意与紧迫感。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帝国主义列强登堂入室，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掀起了以推广西学、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百日维新运动。

危难可以兴邦。戊戌变法本来是天经地义、很得人心的举措。可是，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因为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私利，他们居然操起了屠刀，先发制人，将改革派送上了断头台。这些刀光剑影的背后，反映了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只顾一己之私利，开历史倒车，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一旦错过，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为了使这种专制政体长期存在，守旧派对以宣扬改革为己任的新闻报刊，如本书所论述的《国闻报》百般挑剔，多方压制，迫使他们挂上了日本人的旗号，处境日艰。以致主笔夏曾佑无可奈何地哀叹道：

盖支那者无教化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此理既明，吾党亦可无怨矣。……中国有史以来，大约从无真话，肃党之事，近在耳目之前，亦不可知其详矣。至于今日国民亦知政府之不可信，然亦无从核其实。^①

^①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1986年版，第1338页。

在这种愚昧的政体下，清廷演出了一出“己亥建储”的闹剧。慈禧把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立为大阿哥，准备取光绪帝而代之；又把同改革派关系密切、反对他们“建储”的外国人，当作了仇视的对象。慈禧、荣禄加紧对外备战，筹建行宫，赶造枪炮，并告诫各地督抚：“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口，并且不可存诸心。”^①这道谕旨中的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就是使锐意改革的光绪帝复位，而迫使慈禧交出政柄。

可见，清廷权贵所争者，并非国家前途，乃是争权夺位，唯利是图。

到了庚子春夏之交，慈禧神魂颠倒，恣意妄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利用义和团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一面与列强宣战，一面命令由载漪统带以满人士兵组成的“虎神营”、董福祥所部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东交民巷，火烧教堂，把整个国家引向了危险的边缘，最后以失败告终，落荒而逃。慈禧、荣禄等人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表演，使朝廷颜面扫地，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封建政权的根基。

庚子回銮之后，慈禧等以推行新政相标榜，实际上缺乏改革诚意。清廷高官们利用改革之机，争相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把手中的权力演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至于清廷上层涌现了富可敌国的财主，从慈禧家族，到荣禄、奕劻、那桐家族等，个个肥得流油；但是，百姓困穷，民不聊生，人心离散。本书揭示的伍廷芳心路历程表明，他由清朝高官，最后发展到“不要好处”、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阵营，便是人心离散的一个突出例子。

江山无定数，君王自为之。晚清的统治者在关键时刻，错失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38页。

了改革良机，有许多重大举措，与历史前进方向相违背。他们以为，既有八旗“劲旅”，又有各地新军，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不怕民众起来造反。但是，事实证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最终是无法与人民大众的意志相抗衡的。

其二，玩视新政，无意颁布宪法，实行“立宪政体”，在民主议政问题上，拖延阻拦，自误前程。

庚子回銮之后，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接着宣布厘定官制，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预备立宪运动。这次所谓立宪，与二十多年前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讨论，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一回事，都是将君王手中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民选的议院。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十年（1884）五月十二日，翰林院编修崔国因通过詹事府，向清廷呈递了《后患方深请速筹布置折》和《法国与各国不和，请相机利用片》、《设议院、讲洋务二条请实力实行片》。在上述一折二片中，崔国因对当时的内政外交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最重要的就是设立议院。

崔氏认为：“设上、下议院。凡练兵筹饷各举，使斯民身居其中，悉其原委，而后兵可增，而不以为抽丁；饷可增，而不以为重敛。”“设议院，则财之不足者，可集众议以筹。”与成立议院相适应，崔氏还反对由极少数人裁决国家大政，建议将政事公开，指出，“讲洋务交涉之事，宜明白宣示，使尽人而知之，不宜秘密”。^①

对于崔国因所提出的设议院等建议，清廷并未立即表示可否，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详见孔祥吉《清廷关于开设议院的最早争论》，《光明日报》1988年8月24日。坊间有关崔国因论开议院事论文及著作，多用其《臬实子存稿》，殊欠确。盖此书为光绪二十八年刻本，迥非甲申年向清廷传递之折。

而是让总理衙门大臣逐条认真讨论，再向军机处汇报。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个决定实际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商议后作出的。经过五天的讨论，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对崔国因的内政外交改革建议，逐条作出明确回答。

关于崔氏要求设立上、下议院的建议，议复折是这样说的：“臣等查，外洋以商务为重，上、下均得其利，与中国政体迥殊，若仿其议院之制，无论扰乱政治之大患，即欲增兵增饷，民间有重敛而无分润，蚩蚩之氓，安能尽明大义？其事断不能行，拟毋庸议。”^①

关于公开政事的议复谓：“臣等查，所陈洋务宜讲各节，颇为切当，拟请嗣后酌度机宜，凡可以宣布中外者，勿须事事秘密。至于有关操纵机权，不可令敌人闻之转生枝节之处，仍宜慎重从事，勿稍泄露。是在总署反复讲求，相机办理。”^②

这是中国近代庙堂之上，最早一次对设议院的讨论，比日本晚了十多年。慈禧、奕譞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政体迥殊”，不能照搬，“若仿其议院之制”，势必造成“扰乱政治之大患”。他们匆匆忙忙便把崔国因的建议否决了。实际上，清廷所否决的不单单是崔国因的一个奏折和两个奏片，而且葬送了清王朝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到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又提出了设立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议郎”的建议，要求“三占从二”决定政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又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阔普通武草拟了《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结果慈禧非但没有采纳，反而把为康有为代递此折的阔普通武，从礼部堂官，发配到西宁边远地区“闭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门思过”去了。^①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非但满人高官无立宪之愿望，即使是思想稍稍开通的汉人高官，也从内心反对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当时，军机处颇受慈禧赏识的汉人军机大臣瞿鸿禨，在清廷颁布试行立宪的前夕，广泛征求至亲好友，询问对这场新政，应采取何种立场。其儿女亲家余肇康回了一通密函，可谓肝胆相照，直言不讳。余氏之函曰：

止盦先生钧右：折弁回，奉手教，款款深情，溢于言外，敬闻命矣。大局系于全权，而属目尤在元辅。来书谓随在荆棘，是中国此后无复有康庄也。究竟如何挟持？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所谓仗义执言，乃如是耶？

近两大患，一在日本，一在学生，治乱存亡，胥于是乎在。而此中消息，则视夫宪政之行不行。一行，则更不可为矣。今宜一切新政为后图，而专力于“富强”二字。于何富？节流尤急于开源也。于何强？练兵倍重于兴学也（河间大操，用百数十万；卢汉庆成，用数十万。但举游学一项，岁数百万，加以学堂及一切新政，岁非二千万不可。语其归宿，尽如慈圣所谓皮毛。即如游学，未收其效，先收其害。鄙意不如尽调各学生回国，多延东西教育家来华讲授，暂停游学五年，俾不致耳濡目染，不复知有中国。治标之法，莫急于此）。否则徒事纷更，画虎刻鹄，未见其有当也。在都时，辄与公持此论，观于近事，益信。寒雪霄分，率贡一二，无当宏愷。

希马入大学预备学堂，祇合如此，自较出洋为妥。五小女明春非归小住，无以塞乃母之念，如希马难行，当请其母舅（绩学方雅茂才，年六十矣）来京迎护，则千稳万稳矣。弟即能屏儿女之私，不能释乃母怀思之苦，真所谓左右做人难也。

^①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2008年版，第348页。

敬叩钧安。弟敏顿首。亲家夫人年安，阖潭全第。^①

此函作者余肇康（1854~1930），字尧衢，号敏斋，晚号倦知老人，湖南长沙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留京在工部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外放武汉任道府官。瞿鸿禨进军机处后，余氏官运亨通，升迁迅速，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任江西臬司，次年因南昌教案解职。旋起复，授法部左参议。丁未政潮中以军机大臣瞿鸿禨罢官受牵连而遭免职。回湘后任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主持修筑长株段铁路。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后病卒，著有《敏斋随笔》等。瞿鸿禨之长子希马娶余氏之五女为妻，故二人关系至为密切，密函络绎。其所谓宪政“一行，则更不可为矣”的观点对瞿氏影响至深。瞿鸿禨乃当时汉军机大臣中，思想开通者，而对立宪却三心二意，其他军机处成员如王文韶、鹿传霖等更不必论。清廷最高统治者在对待“立宪”、“国会”这样重大问题上，顾虑重重，远不像明治天皇那样“相率去私见，存公义”，以兑现其《五条誓约》所提出的“万机决于公论”的承诺。慈禧等人把立宪只是当做可使“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工具。他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受不了“万机决于公论”的约束，因此，即使出现了像庚子事件那样严重的错误决策，也绝不改弦更张。清王朝的崩溃，实在是咎由自取。

其三，拒不吸纳新知识，能够参与高层决策的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形成。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国家之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强弱及其参与决策的程度。一个愚昧的国家，如不更新知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知识群体，是注定要遭受屈辱，甚至亡国。

日本于维新之始，即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他们一批又一

^① 余敏斋：《致止龢先生函》（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批地派人赴欧美学习，如饥似渴地用西学来代替传统的儒学；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为日本列岛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西学之在日本，仿佛一滴油滴在水面上，能迅速扩散。

中国情形却与此相反。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闭目塞听，视西学为邪门歪道。从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事件，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界整体进步甚微。北京城里的读书人，绝大多数依然是讲金石考据，跑琉璃厂，以讲西学为离经叛道。晚清的最高决策者慈禧，闭塞昏庸，遇到国家重大疑难问题与军事危机，不是招来五台山的高僧御敌，^①便是请出白云观的道士问策；讲经布道，求神问卜，真可谓不识时务，愚不可及。

当时，北京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名叫盛昱。晚清学人陈恒庆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曰：

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

文中的成均，系指国子监；大司成，则是指国子监负责人祭酒。这位被称为“小圣人”的盛昱，人品端正，满腹经纶，政治上反对慈禧广植私党，多方揽权，但思想却守旧得出奇。在光绪十四年底轰动朝野的是否兴修津通铁路争议中，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呈递了一通《奏为津通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办折》，居然把津通铁路比作“洪水猛兽”。^②盛昱认为，西人铁路，是为那些整日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建造的，因此，

^①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42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津通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办折》，录副奏折档。盛昱此折向清廷传递内容，与其《意园文略》所辑文字，多有出入。

他主张“路少害轻，路多害重，吾不知西人税驾之何所也。陈涉之徒，散在山泽闲者，其少也耶！彼都人士犹且厚自封殖焉。今铁路已开六十年，再阅六十年必败，吾已死，不及见。吾此字，必不灭，或有人收拾之，将服我之先见也”。^①

这位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祭酒”，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吃惊。此折递上后第三天，盛昱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又上一折，建议停止电灯进入禁廷。盛昱称：

奴才闻近日北洋大臣有呈进电灯之事，道路传闻，观者甚众。伏思电器机关，微妙在精，熟其业者，固视为平易之物；而进入禁廷，经手员役断难随入，太监人等，未经娴习，运绰不灵，或有差失，不可不虑。事果属实，即飭停止。奴才愚见所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②

盛昱思想如此守旧，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去世之前，仍在谆谆告诫湖北友人，万勿乘火车出行。盛昱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它整整影响了晚清一代学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盛昱去世之后，王懿荣等代奏上书，请表彰其功绩，其文称：

前在国子监南学肄业翰林院编修喻长林等十四人呈称，盛昱于光绪十年到任，至光绪十五年因病奏请开缺，计在祭酒任内历六年之久。其教士以通经致用为本，根柢程朱，而益之以许郑贾孔之学，俾学者精研义理，以为躬行实践之资。又仿宋儒安定胡氏分经义治事之法，俾学者各治一经一史，及天文、舆地、兵事、农政等门，日有课程，编为札记。前祭酒详加批阅，辨其得失，孜孜训迪，终日无倦。一时肄业者皆争自磨砺，勉为有体有用之学，其有不守学规，及疏旷功课，门径歧出者，则随时惩戒斥逐，立法严整，为从前所未有。

① 盛昱：《意园文略》卷一，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1961年版，第318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十四年。

本学笔帖式向无官课，前祭酒以笔帖式各员，官闲事少，暇日辄与讲明清文译理，为他日当官莅事之资，又创立文字课区分等第给奖，以资鼓励，因材施教，士论翕然。

本学书籍，不敷讲授，前祭酒捐办募置，度藏大备，并筹款生息，酌增廪奖，以资肄业生之诵习，至今赖之。又复派员分门编辑本学则例，条分缕析，考覆详明，一时属僚赖其指授，皆熟于公事，明于掌故。

本学庙学全图旧本，率多疏舛，前祭酒以庙学全图，应纂入会典，非详加厘订不可，乃选派通于算理工绘事者，校补精详，足称善本。本学石经，刻逾百年，当时蒋衡所书多据坊本，错讹不免，是以前大学士彭元瑞于乾隆间曾经派纂《石经考文提要》一书，进呈御览。前祭酒于到官之日，即行奏请谨依石经考文提要，重为修补，旋奉旨依议，遂率学官蔡右年等敬谨考核，一归是正，昭垂千古，安设栅栏，兼资保护。昔后魏崔光领国子监祭酒，修补三字石经，前史侈为盛举。前祭酒修补石经，实与崔光媲美。至于厘剔弊端，体恤寒畯，贡监应乡试者，考到录取后复谒见礼以防假冒之习，而不取其贖。贡监录科奏准，凭同乡官印结入场，不必由本籍起文，以省往返川资之费，皆足以宏栽培之谊，广造就之途。

今距前祭酒莅任已十有余年，六馆诸生，犹复恪奉前规，遵循弗替。逆犯康有为倡为邪说之时，本学肄业者，皆笃守师传，无一人为其煽诱，亦可见以道得民之效矣。今闻前祭酒已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间病故，取等夙承教泽，感念不忘，为此共同呈请代奏，仰恳天恩，将已故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生平事迹，宣付史馆，列入儒林传以彰师范。^①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懿荣等《已故祭酒盛昱请付史馆列入儒林传据情代奏折》，光绪朝录副奏折档，文教类。

王懿荣的代奏折是一件有关晚清国子监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其中谈到戊戌年京城的变法运动如火如荼，而国子监为数众多的学子们，皆笃守盛昱师传，居然没有一人参加到维新派变法的行列。可见，其思想对当时读书人影响何等深远。

晚清知识分子中，虽然也涌现了像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样的先进人物，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传统文人社会，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如此。以参与清廷决策的军机大臣为例，其成员满汉各半。满军机由皇室成员及慈禧所信任之亲贵担任，愚昧守旧，姑且不论。汉军机则是由有科举背景的“知识精英”组成。甲午战争之后，较长时间担任军机大臣的有翁同龢、李鸿藻、王文韶、瞿鸿禛、鹿传霖、张之洞等人。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只有张之洞多少有些新思想，在军机处中堪称是“领导时代潮流的人物”。他在湖北创办了许多新政，从开办新式工厂，到兴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军，派留学生，且劝慈禧速行立宪。但是，张之洞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首次颁布推行立宪的懿旨，次日，即下令官制改革。在讨论过程中稍稍触及了一点司法独立，张之洞迫不及待地两次致电京师谓：

第一通电报称：“（北京锡拉胡同吏部大堂）。鹿尚书：冰前接京城改官制电，本拟即复，因闻各省多不以为然者，故未敢首先提倡驳议。兹知各省已复齐，已于昨日电复。此乃二、三东洋游回学生，浅躁狂悖，剿袭不切题之成文，意欲破坏国家大局，实可愤恨；不意竟有数贵人一力主持，尤为可笑。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默运挽回，功在社稷。外官纲纪，实关治乱安危，稍一不慎，大乱立起，不可救矣。发蒙弥祸，仍望止老。请转达。冰啸。”^①

^① 张之洞：《致鹿尚书电》（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第二通电报称：“鹿尚书：冰昨漾（廿三日）电，论官制局司法独立一条，闻谬党狡辩坚持，诸大臣全不悟其居心蓄谋之所在。止老于此件议论若何？有挽回之望否？此皆东洋学生谬见。现在各报馆皆称各学生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存心叵测。将来裁判，必用东洋法政学生。是天下大权，全归于数百名学生矣。大患无穷，可危，可惧！此节务请转达止老。洞感。（廿七日）密。”^①

张之洞的上述电报，是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发出的。电文中的鹿尚书，系指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鹿传霖；止老，则是指瞿鸿禨，瞿氏字止庵。张之洞是最早主张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地方督抚，而对留学生带回的新思想、新认识，却极为仇视。由此电报不难看出，当时清廷决策人物中之思想水准。这同西方国家的决策层，相去不啻天壤。

思想文化落后，也导致了科技、军事的落后，晚清的洋务运动搞了多年，可是到了甲午年与日本交战时，清军水陆俱败，不堪一击。在东京大学的校史档案馆有关中国的卷宗内，我们曾看到日本“陆军战利品整理委员会事务所”保存的甲午战争缴获的战利品目录清单。该清单记载，在缴获清军武器中，居然绝大多数是古代兵器，有各种“铍剑、古代具足、军刀、弓、箭、青龙刀、长柄刀”等等，其中以弓箭的数量最多。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兵器，反映了晚清王朝的国力与知识水平进展，实在太迟缓了。如果把清朝这一时期参与国家决策的知识阶层，同日本大量起用由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做一番比较，便可知清王朝之垮台，实在是毫不足怪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不少篇章，是2003—2004年在东京大学举办“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的教材，曾在课堂

^① 张之洞：《致鹿尚书电》（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